

日本战时伪蒙疆产鸦片供求调节政策探析^{*}

刘成虎 裴丽婕 高宇

内容提要:在侵华战争期间,日本本土及其占领地之间的鸦片生产、加工、消费等角色定位逐渐清晰。其中伪蒙疆政权控制区是重要的鸦片产地,其定位是向其他占领地提供吸食鸦片和保障伪政权的财政收入。直到日本战败,伪蒙疆政权控制区一直是其最大的鸦片生产和出口地。同时日本通过建立鸦片管理机构、推行鸦片产销及供求调节政策等,在占领地间对鸦片产销进行直接干预,构筑战时鸦片管理体系。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对“蒙疆”所产鸦片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了计划调节。本文以伪蒙疆的鸦片供求调节政策为中心,以伪蒙疆产鸦片的生产和运销、日本殖民当局历次鸦片供求调节会议为线索,对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政策进行探讨,以期更为全面地揭示日本罪恶的侵略行径。

关键词:鸦片 伪蒙疆 供求调节

一、引言

关于近代中国鸦片问题和禁烟禁毒问题的研究,较早的著述是1896年刊印的李圭《鸦片事略》(上、下卷,北平图书馆整理本)。民国时期有关的著述主要有于恩德的《中国禁烟法令变迁史》(中华书局1934年版)和罗运炎《中国鸦片问题》(协和书局1929年版)、《中国烟禁问题》(大明图书公司1934年版)、《毒品问题》(商务出版社1936年版)等。1949年后陆续有一些涉及近代中国烟毒问题的成果发表,但总体不多。目前学界关于日本在中国进行鸦片专卖和毒品侵害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涉及日本的鸦片政策演变、鸦片专卖制度、对中国的鸦片毒害以及破坏中国禁烟政策等方面。一些成果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日本根据国际禁毒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和完善其在占领地的鸦片政策,同时分析其对殖民地经济社会尤其是人民生活的巨大破坏。^①一些学者以青岛、旅顺、大连等日本殖民当局为个案,对其鸦片专卖制度的形成和运转进行了剖析,深入探讨和揭示日本帝国主义鸦

[作者简介] 刘成虎,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副教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太原,030006,邮箱:liuchenghu@163.com。裴丽婕,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太原,030006,邮箱:756119547@qq.com。高宇,日本武藏野学院大学教授,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兼职教授,太原,030006,邮箱:bqqh@ybb.ne.jp。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国民政府禁烟与财政政策研究”(批准号:14CJL00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文中所引日文资料皆为高宇教授提供,高宇教授现因健康原因无法从事科研工作,因此,文中一些日文档案的具体馆藏地、馆藏号或档案号等,笔者暂无法详细提供,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① 参见王宏斌《鸦片——日本侵华毒品政策五十年》,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高宇、刘成虎《试论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政策——以“蒙疆”产鸦片为中心》,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社会史研究》第4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邓月《20世纪初期日本的鸦片政策》,《中国集体经济》2014年第15期;沈口宗之《伪满时期日本政府对华鸦片政策演变分析》,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4年;赵朗、廖晓晴《日本在东北地区实施的鸦片侵略政策——以抚顺千金寨地区鸦片毒品贩卖活动为中心》,《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4期;关捷主编《日本对华侵略与殖民统治》(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栾兆靖《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在辽宁的鸦片政策研究》,《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许婧《抗日战争之前及期间日本对华毒品政策》,硕士学位论文,兰州大学,2013年。

片贸易的罪恶以及以鸦片财政为支撑的收支体系。^①一些成果详细分析了日本政府和殖民当局纵容、支持和组织鸦片的种植、贩卖和吸食等具体实施过程,着重探讨对中国的鸦片毒害。^②还有一些成果从中国禁烟禁毒史的角度对中国毒品泛滥问题进行探讨,分析中国政府禁烟禁毒政策的得失。其中有很多内容涉及日本法西斯有预谋地破坏中国禁烟政策和反对禁烟运动的过程,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反人类、反人道的战争暴行。^③另外在资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学术界也做出了很多努力,整理了一些档案资料,如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的《日本鸦片侵华资料集(1895—1945)》,^④即是非常珍贵的文献。

在日本和中国台湾省,近50年来也有一批专家学者对此进行探讨,但近年来的研究相对比较沉寂。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日本学者在研究的过程中带有明显的自我辩护,无视历史事实,因此有必要立足客观史实对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专卖政策进行真实反映。

本文以伪蒙疆的鸦片供求调节政策为中心,以伪蒙疆产鸦片的生产与运销、日本殖民当局历次鸦片供求调节会议为线索,对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政策进行探讨,以期更为全面地揭示日本罪恶的侵略行径。

二、日本操纵下的伪蒙疆鸦片生产与运销

在关东军主导下,1937年11月22日,察南、晋北、蒙疆三个临时伪政权合并为伪蒙疆自治政府。伪蒙疆政权控制区在地理范围上主要指原绥远省大部 and 山西北部及察哈尔的一部,该区域是日本军部设想的“防共地带”和对苏作战基地,被军部视为“承担帝国国防政策使命”的特殊地区,^⑤这一地区最高决策者实际是日本驻蒙军司令官。^⑥日本军部认为伪蒙疆政权必须有“经济自立”能力。为了扩大财政收入,伪蒙疆政权在控制范围内废除国民政府禁烟法令,模仿伪满洲国设立鸦片专卖制,公开允许种植、贩运、吸食鸦片和其他毒品。而鸦片的种植、运输、加工、销售,都是在日军实际支配、操纵和保护下进行的,烟毒泛滥到所有日本占领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确保日本主要占领地的鸦片生产和供给成为重要和急迫的问题。具体措施是在各地销售伪政权控制区所产鸦片,并保证以伪政权要求的价格支付。因此日本华北、华中派遣军、派遣军特务机构及后来的兴亚院、日本政府厚生省和内阁,都参与了伪蒙疆政权控制地区的鸦片种植与分配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1937年12月24日,伪蒙疆政权刚成立一个月,就宣布废除原有禁烟法规和机构,由日本顾问制定《鸦片业务指导要领》,包括鸦片买卖、征税、运输、取缔、种植等方面;设立清查总署,负责管理鸦片生产和运销;设立蒙疆土药公会,下设蒙疆土药公司,负责收购和运销鸦片,默许鸦片运销、消费、烟

① 参见高宇、燕红忠《日本占领青岛期间的鸦片专卖与占领财政》,《中国经济史研究》2015年第1期;杨洋《日本在“关东州”鸦片制度研究(1906—1931)》,硕士学位论文,辽宁大学,2013年;刘成虎、高宇《旅大日租界的鸦片专卖与毒品走私》,《中国经济史研究》2012年第3期。

② 参见赵朗《日本在满铁附属地的鸦片贩毒罪行》,《理论学刊》2013年第7期;曹大臣、朱庆葆《刺刀下的毒祸: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毒化活动》,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顾明义等主编《日本侵占旅大四十年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李淑娟《日本殖民统治与东北农民生活(1931—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欧文·华莱士(Irving Wallace)著,王金铃译《见证罪恶:日本的“我的奋斗”》,济南出版社2005年版。

③ 参见马模贞等编著《中国百年禁毒历程》,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王金香《中国禁毒简史》,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王金香《中国禁毒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韩华《罪证:从东京审判看日本侵华鸦片战争》,中国言实出版社2015年版;邵雍《中国近代贩毒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卜正民、若林正《鸦片政权》,黄山书社2009年版;吕天石《日本侵华期间天津毒品问题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4年;高宇、刘成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地区鸦片泛滥原因》,《日本问题研究》2013年第2期。

④ 邓一民主编:《日本鸦片侵华资料集(1895—1945)》,中共河北省委党史研究室2008年编印,内部资料,冀出内刊第1085号。

⑤ 日本興亞院蒙疆連絡部「狀況報告」,1941年4月;「蒙疆關係政策文書/3蒙疆の狀況報告の件」,1941年,0283—0284頁。

⑥ 興亞院蒙疆連絡部「蒙疆の政務指導に關し駐蒙軍と興亞院蒙疆連絡部との間の取極要綱(案)」,1941年9月;「蒙疆關係政策文書/3蒙疆の狀況報告の件」,1941年,0291頁。

具的制造买卖和保有。日本当局则为其鸦片政策提供全面的支持。1938年2月又制定《鸦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所有鸦片税归税务管理局征收。同时在《鸦片业务指导要领》的基础上制订和颁布了一系列实施细则。^①

1938年初，日本殖民当局利用飞机投撒种烟手册，并免费发放罂粟种，同时提供向归化城运输的交通便利，其目的就是鼓励农民种植鸦片，提高鸦片收成和销售额，以便获得高额的鸦片特税。在归化收购的鸦片被大批量运到张家口。“张家口成为蒙疆地区鸦片集散中心。归化城有40余家收购店。日本人对生产鸦片不征税，只缴普通地租。农民向归化城商店送鸦片，以每盎司伪联银券4元价格收购。”^②之后，伪蒙疆政府控制区内鸦片生产迅速增加，1938年鸦片出口额达4382.1万元，占其输出总额近4成。^③1938年下半年，因甘肃原种植罂粟地区多已改为种植一般作物，绥远取代了甘肃成为主要鸦片产地。绥远农民虽因粮食不足，种植谷物愿望非常强，但由于被利诱或被强制，不得不改种鸦片，绥远鸦片种植面积空前扩大。但1939年内蒙地区遭受罕见的大水灾，鸦片收获比预期降低了二成，谷物生产也只有往年的一半，出口额大幅度减少。同时日本恢复西北贸易的企图也遭失败，加上进口剧增，其贸易收支出现巨额入超，如表1所示，达2800万元。

1940年，谷物出口依然不振，蒙疆伪政权的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而伪政权的出口全赖鸦片支撑，总出口额1.15亿元中，有6300万元来自鸦片出口，占55%。为挽救伪蒙疆政权财政，日本、伪满洲国银行、伪联合准备银行，分别给予伪蒙疆政府700万元、750万元、439万元信用贷款，其财政仍入不敷出。伪蒙政权不得不暂缓支付5400万元的对外汇兑。1941年出口形势好转，但对鸦片出口的依赖依然很大，鸦片出口仍占出口总额的42%。

表1 1938至1941年伪蒙疆政权控制地区进出口额 单位：元

年度	出口额	进口额	净出口额	出口鸦片	出口鸦片占出口额(%)
1938	116 000 000	70 000 000	36 000 000	43 821 175	37.8
1939	92 000 000	120 000 000	-28 000 000	15 914 466	17
1940	115 000 000	159 000 000	-44 000 000	63 000 000	55
1941	183 770 000	169 100 000	-14 670 000	77 183 400	42

资料来源：日本興亜院蒙疆連絡部「狀況報告」，1941年4月，「蒙疆關係政策文書/3蒙疆の狀況報告の件」，1941年，0283—0284頁。1941年数据参看「蒙疆に於ける薬材薬品に関する需給調査」，大东亚省「調査月報」，1943年5月，69—70頁。

说明：1939年出口鸦片数据为出口平津的鸦片金额。

另外，西北抗日力量抵制也是造成伪蒙疆政权财政困难的重要原因。起初，日军特务机构企图利用西北贸易获得棉花、羊毛、鸦片等战略物资，同时让伪蒙疆政权从中获利，以实现“经济独立”的目的。针对日本特务机构和伪蒙疆政权的企图，中国共产党提出“种棉亡国”的口号，奖励种粮，禁止将棉花出售给日军。日军想通过组织羊毛同业公会采购西北地区的羊毛，宁夏政府发布禁运羊毛到敌占区的禁令，回民也拒绝出售羊毛给日军，而苏联得知日本计划获取西北羊毛资源的情报后，以高价在西北采购羊毛。这些措施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其期待的西北贸易连一成也未达到，导致羊毛同业公会一度解散。^④这些措施使得日伪当局从过境贸易中获利的企图落空，并加剧了其财政困难。

为了解决伪政权的财政困难，日军在1940年初对当地鸦片生产和流通作了全面的调查。1938

① 实施细则有《鸦片栽培税暂行规则》《鸦片印花税暂行规则》《鸦片公会暂行取缔规则》《鸦片批发暂行规则》《鸦片运输暂行规则》《吸食鸦片暂行取缔规则》等。

② 米国財政部の報告「察哈爾、綏遠ノ阿片栽培」。原文收在「A極東國際軍事法廷裁判記録」(和文)(No.17、18)24—26頁中，但既无作者名字，又无提出日期。其内容提到，起草报告时正是鸦片收获期7月，又提到支付货币用伪联银券，伪联合准备银行开业是1938年3月10日，据此可判断此报告成稿是1938年7月间。

③ 岡部部隊本部「蒙調査特第十四号蒙疆ニ於ケル阿片事情」，1940年3月。

④ 外務省の調査部第三課「滿支回教徒工作ト西北關係(旅行報告)」，1939年4月。

年其出口货物中鸦片占首位,出口量达9 854 779两。1939年伪政权将鸦片种植面积扩大到1 011 000亩,具体分布如表2所示。察哈尔及巴彦塔拉地区占80%。另外在巴彦塔拉与宁夏、山西接壤的“治安不良”地区,还有很多私种的情况,收获量估计达150万两。私种面积相当于伪政权许可面积的20%以上。^①

表2 1939年蒙疆伪政权鸦片种植面积和产量估计

地区	许可种植面积(亩)	收获估计量(两)
察哈尔及巴彦塔拉	846 000	6 345 000
晋北	155 000	1 163 000
察南	10 000	75 000
合计	1 011 000	7 583 000

资料来源:岡部部隊本部「蒙調資特第十四号蒙疆ニ於ケル阿片事情」,1940年3月。

但1939年鸦片播种期遭旱灾、割浆期遭前所未有大水灾,鸦片收获量比当初预计约减少20%。当年12月蒙疆土药公司实际收购量如表3所示,只有845 045.11斤,仅上交744 881.20斤,其中还包括上年存货。

表3 1939年蒙疆土药公司收购量

日期	分公司	收购数量			上交数量	
		数量(斤)	单价(元)	补偿金(元)	数量(斤)	补偿金(元)
12.17	厚和	130 269.91	3.350 0	435 870.14	171 100.00	394 325.00
12.24	大同	82 433.52	3.352 7	276 376.02	46 000.00	
12.15	丰镇	82 418.77	3.209 6	264 534.71	64 000.00	207 305.00
12.18	包头	59 507.32	3.343 1	198 939.33	51 200.00	713 770.00
12.14	萨县	88 764.87	3.280 5	291 194.59	61 292.50	205 004.30
12.17	托克托	149 208.03	3.362 6	494 812.35	153 400.00	508 535.00
12.19	兴和	55 336.82	3.478 1	192 479.21	55 336.82	192 479.21
12.10	张北	79 709.25	3.408 8	271 709.32	79 709.25	271 709.32
12.20	崇礼	110 173.21	3.408 9	375 566.27	110 173.21	375 566.27
10.30	集宁	533.97	—	1 887.87	—	—
12.19	多伦	6 668.42	—	21 545.37	6 669.42	21 545.37
合计		845 045.11	—	2 824 915.18	744 881.20	2 350 239.47

资料出处:岡部部隊本部「蒙調資特第十四号蒙疆ニ於ケル阿片事情」,1940年3月。

七七事变前,绥远鸦片年产量号称1 000万两,区内消费约700万两,其余300万两与西北过境的1 000万两运销京津地区。因受灾和西北贸易断绝的影响,如表4所示,1939年伪蒙疆政权运销外地数量只有上年9 854 779两的三成,仅为2 652 411两。尽管如此,包头特务机关为了向其他地区渗透,许可向西北后套地区输出9万余两,金额达56.8万元。^②

表4 1938年10月—1939年9月向京津运销状况

发货地	出口量(两)	出口金额(元)
张家口	459 210	2 755 260
大同	190 437	1 142 622
包头	110 523	663 138
萨拉齐	195 617	1 173 702

① 岡部部隊本部「蒙調資特第十四号蒙疆ニ於ケル阿片事情」,1940年3月。

② 岡部部隊本部「蒙調資特第十四号蒙疆ニ於ケル阿片事情」,1940年3月。

续表 4

发货地	出口量(两)	出口金额(元)
厚和	625 244	3 751 464
集宁	1 052	6 312
丰镇	1 070 328	6 421 968
合计	2 652 411	15 914 466

资料来源:岡部部隊本部「蒙調資特第十四号蒙疆ニ於ケル阿片事情」,1940年3月。

由于产地受灾和京津鸦片存货减少,导致了市价高涨和区域价格差增大,进一步加剧了鸦片走私。如表5所示,仅1939年8月—11月估计走私数量达45万两。走私通过京包、同蒲线进行,手段是乘车携带、行李托运、列车员、食堂员工夹带,也有利用铁路员工在大量货物中夹带或邮局员工利用货物列车夹带,还有利用航空行李携带者。陆路走私主要通过走私基地进行。日方认为走私基地在察南有永宁镇、青龙桥、片子沟、康庄,晋北有应县、浑源、山阴、广武镇,巴彦塔拉有清水河、河口镇。其方向是察南向京津,晋北向太原,巴彦塔拉则分为向东胜和太原的两股。^①

表 5 1939年伪蒙疆产鸦片走私数量估计

月份	运往地区	推测数量(万两)	备注
8	京津	6	通过京包线及陆路运出
9	京津、太原	15	通过京包、同蒲线以及陆路运出
10	京津、太原	9	—
11	京津、太原	15	—
合计	—	45	—

资料来源:岡部部隊本部「蒙調資特第十四号蒙疆ニ於ケル阿片事情」,1940年3月。

1939年以后,军部和兴亚院开始直接插手销售“蒙疆”鸦片,当地所产鸦片开始每年销往伪满、伪临时政权控制区、伪维新政权及汪伪控制区。为确保鸦片供应和伪蒙疆政权的财政来源,伪政府于1939年4月制定《鸦片政策施行要纲案》,6月颁布《暂行鸦片管理令》《土药公司法》《清查总署官制》《清查署官制》《清查工厂官制》《暂行阿片管理实行规则》和《暂行阿片稽查施行手续》等鸦片专卖法令,统筹鸦片生产和销售各个环节。至此基本废除之前的鸦片税收管理政策,全面实施鸦片清查制度。^② 经过一系列制度修订后,1940年实际鸦片收购量达到政府计划量的90%多,为4 925 989两,如表6所示。

表 6 1940年鸦片收购计划与实际收购量 单位:两

地区	计划收购量	实际收购量	比例(%)	上一年存销量	合计
张家口	1 163 000	2 098 959	180.5	17 604	2 116 563
大同	887 000	929 655	104.8	69 323	998 978
厚和	3 226 000	1 897 415	58.8	1 704 997	3 602 412
合计	5 276 000	4 925 989	93.4	1 791 924	6 717 913

资料来源:江口圭一『日中アヘン戦争』岩波書店,1988年,122、123頁。

1940年12月,兴亚院联络委员会干事会议决定,要致力于完全收购当地鸦片,并使之在最短时间内以合理价格向华北、华中运销。在计划中要求第二年向华北、华中供给最低数量为860万两,价

① 岡部部隊本部「蒙調資特第十四号蒙疆ニ於ケル阿片事情」,1940年3月。

② 江口圭一『资料日中战争期阿片政策—蒙疆政权资料を中心に』岩波書店,1985年,553頁。在张家口设清查总署;在张家口、大同、厚和(呼和浩特)设清查署;张家口又设清查局5个、清查分局18个,大同设清查局5个、清查分局12个,厚和设清查局8个、清查分局18个。

格要求不得低于每两15元。这是日本特务机关制定鸦片供求计划的最初尝试。^①

在鸦片清查制度和专卖制度下,1941年8月底就完成收购量750万两,10月底突破1000万两,当年鸦片收购总量达到1115万两,如表7所示。

表7 1941年鸦片收购计划与实际收购量 单位:两

地区	计划收购量	实际收购量	完成比例(%)
张家口	2 834 000	4 377 976	154.5
大同	1 310 000	2 369 400	180.9
厚和	3 406 000	4 398 490	129.1
合计	7 550 000	11 145 866	147.6

资料来源:江口圭一『日中アヘン戦争』岩波書店,1988年,122、123页。

在此期间,华北派遣军与伪蒙疆政权举行经济调整会议,以加强华北伪政权和伪蒙疆政权的经济合作。会上关于鸦片问题提出4点措施:其一,华北与蒙疆的合同是至1942年6月底购买350万两鸦片。至1941年12月交割160万两。关于采购价,为保证华北土药业的销售,应尽量调低,但前提是满足蒙疆伪政权希望的价格,即1两14元,但吗啡含量应不能低于8.5%。其二,在华北应尽量避免鸦片价格急速变动。其三,为防止走私,华北伪政权对华北产鸦片(包括从蒙疆走私品)提高税率,减小华北和蒙疆之间的税负差距。其四,为利于蒙疆鸦片销售,华北应根据蒙疆的要求采取限制种植面积的措施。^②

三、1941年后日本主导下的伪蒙疆产鸦片供求调节

1931年3月日本内阁成立鸦片委员会,主要职能是与禁烟国际条约对接和国际会议机构联络,同时进行国内与国际间鸦片和麻药政策的调整。1939年日本在国际联盟鸦片咨询委员会的会议上遭到英、美、中等国代表攻击,指责日本政府纵容鸦片买卖,并提交了大量日本殖民当局从事鸦片专卖的证据。日本政府认为有关鸦片的国际对话已失去实际意义,于是1940年10月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撤销原鸦片委员会。但日本并不愿放弃作为支持战争财政手段的鸦片政策,而且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在各殖民地和占领地间调剂鸦片余缺、保证供给的重要性日益增大。因此由于“内、外地以及日元圈各国鸦片管理、生产及需求调整的重要性增加,而且鉴于若无相关部门联系协调,将难于制订正确对策”,决定设置鸦片事务协议联络会(简称鸦片协议会),其主要责任是“保持各部门间联系及消除设施方面障碍”。^③ 这是由日本和主要殖民地构成的鸦片供求调节机构,从1941年4月开始正式启动。

1941年初,由于外汇短缺和国际贸易的停顿,日本和主要殖民地间的鸦片供求出现了很大缺口。加之鸦片种植与粮食生产严重冲突,增产非常困难。于是日本与土耳其重启关于鸦片进口谈判,同时针对各地鸦片需求,在有关部门间进行调整。^④

在殖民地与占领地间的鸦片调整中,蒙疆和华北的鸦片生产和输出具有重要地位。1941年6月,鸦片年度(每年7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将结束,日本占领地的鸦片供应(除朝鲜以外)都告紧缺,尤其是伪满洲国的缺口巨大。于是6月24日鸦片协议会举行紧急会议,将朝鲜

① 高宇、刘成虎:《试论日本侵华期间的鸦片政策——以“蒙疆”产鸦片为中心》,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社会史研究》第4辑,第148页。

② 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月报」,1941年8月。

③ 阿片委员会决议「阿片委员会废止後ニオケル関係官庁間ノ連絡ニ関スル件」,1941年3月31日。有关机构主要包括企划院、对满事务局(含关东局)、兴亚院、内务、外务、大藏、司法、递信、拓务(含朝鲜总督府、台湾总督府、桦太(库页岛)厅)、厚生省的各厅。由厚生省负责鸦片协议会的具体事务和联络,有关各部须指定主任联络官。

④ 日本政府阿片委员会决议「阿片委员会ニ於ケル厚生省衛生局長ノ阿片麻葉取締並ニ需給状況ニ関スル報告要旨」,1941年3月31日。

总督府现存的 2 810 公斤分配给旅大殖民当局和日本厚生省等以解燃眉之急。1941 年 10 月 13 日鸦片协议会再次开会,以汇总各地鸦片供求情况并制定了朝鲜鸦片分配方案。表 8 和表 9 显示,当年需求预测和朝鲜鸦片分配状况和各地收获量的预测都表明,在日本和各殖民地鸦片供求环节中,朝鲜是主要鸦片增产预定地区和输出地。伪满洲国是主要消费地和产地。对于伪满洲国消费和生产的巨大缺口,会议提出了弥补供求缺口对策:“只能依赖蒙疆产或中国产鸦片,因此应与各有关部门联系善加处置。”^①

表 8 1941 年度鸦片需求和朝鲜鸦片分配 单位:公斤

地区	需求数量	朝鲜鸦片分配数量
朝鲜	2 140	2 120
台湾	8 000	7 677
关东州(旅大)	28 000	18 183
伪满洲	300 000	17 000
合计	338 140	45 000

资料来源:厚生省衛生局「阿片事務連絡協議会記録」,1941 年 10 月 13 日。

表 9 1941 年 10 月 13 日鸦片协议会内外地鸦片收获量调查 单位:公斤

地区	1939 年度	1940 年度	1941 年度(预计)
日本国内	30 460	27 414	21 000
朝鲜	26 701	32 000	45 000
伪满洲国	240 000	195 000	—
桦太(库页岛)	—	8 770	—
合计	297 161	263 184	—

资料来源:厚生省衛生局「阿片事務連絡協議会記録」,1941 年 10 月 13 日。

1941 年 12 月兴亚院各地特务机构代表会议又策划了成立“东亚鸦片对策委员会”的计划,^②负责协调日本、伪满、汪伪政权统治区的鸦片政策。这是构筑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鸦片条约及管理机构的第一步,其实际目的是调节主要占领地间鸦片供求。而日本政府对“蒙疆”所产鸦片也在更大范围上进行计划调节,规定在日本本土和中国台湾、朝鲜、伪满、库页岛范围内由厚生省卫生局调节每年鸦片生产与分配;在中国和南方占领区组织大东亚省联络会议,由大东亚省、兴亚院、军部、伪政权顾问调节每年鸦片生产与分配。^③

1941 年 12 月 16 日,兴亚院联络会议制定了 1942 年的鸦片供求计划。根据华北、华中、伪满、本土的需求,决定伪蒙疆政权控制区生产数量和向各地的分配计划,并要求在下一年度鸦片生产开始前实施。^④之后又两度对计划进行调整,其三次计划数量如表 10 所示。

1942 年“蒙疆”鸦片产量只有 700 万两,远未完成 1 000 万两的生产计划。此时日军东南亚占领地对鸦片产生更大需求,于是兴亚院联络会议在 1942 年 8 月和 9 月两度修正鸦片分配计划,供给南方(东南亚)占领地的鸦片由 0 上升到 24 万两,之后又迅速攀升为 124 万两。同时大幅削减对华北、华中的分配量,以优先满足军部的需要。

① 厚生省衛生局「阿片事務連絡協議会記録」,1941 年 10 月 13 日。

② 该计划要点如下:1. 为协调东亚的鸦片及麻药根本对策、取代根据现存鸦片关系国际各条约的鸦片委员会,在将来适当时机设置东亚鸦片对策委员会(暂定名);2. 东亚鸦片对策委员会设在东京;3. 东亚鸦片对策委员会先由日本、伪满、汪伪政权三方委员组织;4. 东亚鸦片对策委员会负责三者间政策统一调整。

③ 兴亚院幹事会決定「東亞阿片對策委員會設置要綱」,1941 年 12 月 11 日。

④ 興亞院連絡委員會「昭和 17 年度支那阿片需給計畫數量ニ関スル件」,1941 年 12 月 16 日。

表 10

1942年兴亚院联络部伪蒙疆产鸦片供求分配计划

单位:千两

地区	分配计划	参考	
		1942年8月案	1941年12月案
蒙疆地区供给南方(东南亚)占领地鸦片	1 240	—	—
南方派遣军司令部	950	—	—
第14军	50	—	—
海军	240	—	—
蒙疆地区内鸦片收获量	7 000	7 000	10 000
供给华北地区量	500	1 500	2 700
供给华中地区量	3 700	3 760	6 000
供给日本量	600	600	600
供给关东州量	200	200	200
供给伪满洲国量	500	500	500
供给南方占领地量	1 240	240	0
区内消费量	200	200	400
转入下年量	0	0	100

资料来源:陸軍省軍務課「昭和17年度支那阿片需給計画数量ニ関スル件」,1942年9月23日。

说明:1两为36克。

自1939年军部和兴亚院直接插手销售“蒙疆”鸦片之后,该地区的鸦片供给调节就在日本殖民当局和伪政权的控制下进行,是日本占领区内最大的鸦片生产和出口地之一。表11显示,在伪蒙疆政府4年的收购额中,本地区的消费额仅为704 129两,占3.6%,其他96.4%的收购鸦片外运输出,达19 122 066两。其中,运往上海方向的最多,达10 980 000两,占比55.4%;其次是运往北平方向的4 005 000两,占比20.2%。另外运往伪满洲的2 380 000两,占比12%。从年度看,1942年鸦片供给分配额,也与当年兴亚院联络部制定的蒙疆产鸦片供求分配计划中的比例变化相吻合。

表 11

1939至1942年伪蒙疆政权收购鸦片供给分配额

单位:两

年度	北平	天津	唐山	济南	上海	伪满洲	日本	其他	本地
1939	300 000	100 000	100 000	100 000	100 000	—	—	27 000	141 429
1940	1 205 000	520 000	—	—	2 005 000	80 000	—	10 000	252 300
1941	1 200 000	—	—	—	3 848 000	300 000	—	—	144 100
1942	1 300 000	—	—	—	5 027 000	2 000 000	841 666	58 400	166 300
合计	4 005 000	620 000	100 000	100 000	10 980 000	2 380 000	841 666	95 400	704 129
占比(%)	20.2	3.1	0.5	0.5	55.4	12	4.2	0.5	3.6

资料来源:江口圭一「資料日中戦争期阿片政策—蒙疆政权資料を中心に」,岩波書店,1985年,170页。

1943年11月又召开鸦片协议会,分析讨论各地鸦片生产情况和供求缺口,并形成下一年度鸦片的供求分配计划。会议指出:“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东亚省(包括南方)政治性鸦片供求对策,由大东亚省鸦片会议讨论决定。由日本本土和主要殖民地构成的本协议会,主要协商供给制药原料鸦片。为保证其顺利运行,两者齐头并进。”^①从会议的内容来看,一是新设的部级殖民地管理机构大东亚省开始取代特务机构兴亚院负责鸦片的供求调节计划,管理机构的级别和职能提升,表明日本对鸦片管理和调节的范围在扩大。二是确保“制药原料鸦片”,是为了对高纯度毒品生产原料的分配和生产的的管理,“政治性鸦片供求对策”的目的也是为削弱、消除占领区人民的反抗意志。

四、结语

鸦片收入对财政的巨大支撑作用诱使日本殖民当局和伪政权实施鸦片专卖和鸦片供求调节政

^① 厚生省衛生局長「阿片連絡会議開催ニ関スル件」,1943年11月16日。

策,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以毒养战”鸦片政策的直接动因。因此大量种植和贩卖鸦片以及加工和销售高纯度毒品,是日本政府和军部在殖民地一贯实施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太平洋战争以后,分别由厚生省实施日本本土和主要殖民地间的生产与分配,由兴亚院及后来的大东亚省掌握中国占领区和东南亚占领区的生产与分配,并形成了由两者预先制定全面供求计划并根据实施状况修正计划的调节体制。

Analysis on the Regulation Policies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Opium from Puppet Mengjiang during Anti-Japanese War

Liu Chenghu Pei Lijie Gao Yu

Abstract: During the war of Japanese aggression against China, the roles of opium production, processing and consumption in Japan and its occupied areas became clear gradually. Among them, the areas controlled by the Mengjiang regime were important opium producing areas, which mainly provided opium to other occupied areas and guaranteed the financial revenue of the puppet regime. The areas controlled by the puppet Mongol regime had been the largest producer and exporter of opium until the defeat of Japan. At the same time, Japan directly interven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of opium in occupied areas 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wartime opium management system by establishing opium management institutions and promoting policies on the production and marketing and the regulation of supply and demand of opium.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Pacific war,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adjusted the opium production in puppet Mengjiang on a larger scale.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opium policy during Japan's invasion of China in order to reveal the evil aggression of Japan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way, which based on the opium supply and demand regulation policy of puppet Mengjiang according to the opium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in puppet Mengjiang and the opium supply and demand regulation meetings held by the Japanese colonial authorities.

Key Words: Opium, Puppet Mengjiang, Regula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责任编辑:高超群)